

##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與十八世紀初的奢 華辯論\*

陳建元\*\*

奢華在十八世紀初的英格蘭是備受爭議的話題，許多思想家針對奢侈品的道德含義及其在經濟上的必要性展開了辯論，而著名小說家與政論作者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也參與了這場辯論。笛福曾經撰寫過大量關於商人與商業的著作，過去學者對於笛福對奢華的看法因此有所討論，但是關於笛福與當代作家——特別是學界公認此辯論中的重要作家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對奢華看法之細緻異同，則尚未有令人滿意的研究。本文主旨便是要釐清並且清楚描述、對比笛福與同時代作家的異同與彼此之間的辯論。以下第一部分回顧了當代關於奢華辯論的既有成果，以及本文所能貢獻之面向。第二部分則是精要地指出十八世紀初的這場辯論之重要參與者，以及重要的辯論面向，主要是透過這場辯論中的代表性作家曼德維爾與笛福之異同來展開討論。第三部分將重點放在笛福對奢侈品的定義，以及他如何以寫給商人的手冊《英格蘭商人全書》來捍衛適度奢侈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第四部分通過實例探討了貿易、奢侈和邪惡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它們之間的界限所在。第五部分則是將奢侈之發展放入了笛福對於文明的思考之

---

\* 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使本文得以更臻完善，筆者衷心感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中。笛福認為奢侈不僅能夠促進國家之強盛，而且在生活當中富含比過往更加細緻之享受，正象徵了該社會已經在文明上進入了更高之階段。最後一部分總結道，笛福指出奢侈品雖對於人類之生存無實質性意義，卻提高了大眾的生活水準，維持和改善了窮人的生活；奢侈品的存在因此是有必要的。在十八世紀初這個嶄新的商業時代當中，笛福雖未建立起調和道德與奢華之間衝突關係的論述，不過他已相對全面地從國家的強盛以及大多數人民的生計，來強調全面擁抱奢侈品會比嚴格地禁絕奢侈品來得有利。對於食衣住行的過度講究雖然是種不幸，但是在這個時代卻已經跟眾人的公共利益緊緊結合在一塊。

關鍵詞：笛福、奢華、人性、十八世紀英格蘭、消費

## 一、前言

本文探討十八世紀上半葉英格蘭的著名政論家與小說家丹尼爾·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 對於奢華 (luxury) 的思考，並且將其放至十八世紀關於奢華的辯論之脈絡中，探索笛福與其他思想家對奢華看法之異同與意義。自 1980 年代始，隨著對消費社會、商業社會研究之勃興，關於奢華之研究亦於此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約翰·塞科拉 (John Sekora)、羅伊·波特 (Roy Porter, 1946-2002)、約翰·布魯爾 (John Brewer)、瑪欣·伯格 (Maxine Berg) 所主編以及撰寫的專著與論文集為此時之代表性研究。<sup>1</sup> 這些研究除了探討了消費模式轉變之外，也探討了奢侈品所帶來的辯論。在這場經濟成功的熱潮中，人性中的慾望所扮演的角色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塞科拉在《奢侈：從伊甸園到斯莫利特的概念》中指出，到了十八世紀「奢華已經成為一個流動的、複雜的概念，其中道德、宗教、經濟和政治態度被混合成一個模糊的、矛盾的混合體」。然而，他也補充道，儘管當時作家們對這個詞的用法有顯著差異，但在十八世紀，「奢華可能是最大的一個社會問題和最大的一個普遍現象」。<sup>2</sup> 不過，誠如瑪欣·伯格與伊麗莎白·埃格爾 (Elizabeth Eger) 所指出的，主張奢侈品是一種進步的社會力量的作家們，在十八世紀並未輕易地便取得優勢，而是不斷受到詆毀者的挑戰。<sup>3</sup>

一方面，消費奢侈品推動了經濟之昌盛。另一方面，對消費的無節制慾望有可能使男人失去男子氣概。古典德性認為人之慾望應該被控制在必要的範圍內，而不受控制的消費慾望則被妖魔化。<sup>4</sup> 伴隨著消費社會的產生，奢華

---

<sup>1</sup>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Ann Bermingham and John Brewer, eds.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1600-1800: Image, Object, Text* (London: Routledge, 1995); Maxine Berg and Elizabeth Eger, eds.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sup>2</sup> John Sekora, *Luxury: The Concept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Eden to Smollett*, 48, 75.

<sup>3</sup> Maxine Berg and Elizabeth E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xury Debates," in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5.

<sup>4</sup> 經典討論見 Sekora, Maxine Berg,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辯論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派支持從貪婪中所滋生的利潤、效益，另一派是基督教道德家的傳統利益，他們反對過度的物質舒適和感官享受。這是十八世紀英格蘭、法國最持久和最為廣泛的辯論之一。這場辯論絕不只是僅僅關於奢侈品的辯論，因為奢華辯論中的關鍵思想家很少討論實際物品；或許可以說，奢華並不是一個物品，而是一種概念。<sup>5</sup>

由於奢華一詞的豐富涵義及其概念性，這場辯論涉及的問題比簡單的消費要廣泛得多，牽涉到如進步、德行、農村與城市生活、資產階級的崛起、藝術和科學、商業、人類的激情、禮儀或整個文明等問題。因此，它也有不同的名稱，例如關於羸弱氣質(Effeminacy)的擔憂、或是「慾望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孰優孰劣的討論。<sup>6</sup>舉例而言，替奢華辯護的著名作家之一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便指出，奢華不會像法國大主教弗朗索瓦·費內隆(Francois Fenelon, 1651-1715)所說造成人的羸弱和國家的腐蝕；相反地，奢華能夠改進物質生活，並且讓整個國家變得更加「勤勞、富有和強大」。<sup>7</sup>因此，在十八世紀初前後，私人慾望與公共利益的關係，亦即阿爾伯特·赫許曼(Albert Hirschman, 1915-2012)所說的慾望與利益之關係，是西歐大部分地區的政治思想家所關注的問題；也因此當這些思想家轉向經濟事務時，他們關注的焦點多集中在消費者的動機，以及他們的行為的經濟和道德含義。

研究笛福的傳記作家、文學批評學者或者是經濟史家也都對笛福思想與奢華的關係進行過相關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研究笛福的權威學者之一約翰·羅伯特·摩爾(John Robert Moore, 1890-1973)盛讚笛福是「現代」自由放任經濟學的先驅，而二十世紀下半葉笛福研究的泰斗學者馬克西米利安·諾瓦克(Maximilian E. Novak)則堅持笛福的經濟思想應該被歸類在重商主義的傳統

---

<sup>5</sup> Christopher J. Berry, *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p>6</sup>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sup>7</sup>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ed. F.B. Kaye, vol. 1, With a Commentary Critical,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by F.B. Kaye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988), 7.

之中。<sup>8</sup>此外，像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研究笛福的學者布蘭·迪克斯拉 (Bram Dijkstra) 則主張笛福採取的是資本主義思維，她認為笛福作品中充滿了像是剝削、異化、利潤最大化等等觀念的雛形。然而，湯瑪斯·邁耶 (Thomas Meier) 在其專門探討笛福經濟思想的專著中則提醒讀者，當我們在討論笛福的商業思想還有像是他對於奢華的討論時，應該要將其說法放回其所屬的歷史脈絡中，而不該硬將現代經濟學理論套在其上頭。<sup>9</sup>

笛福的眾多著作，特別是《英格蘭商人全書》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725-1727*) (下簡稱為《全書》) 中針對奢華所發表的評論，其實與同時代思想家們對於奢華的關切若合符節，例如笛福與他們都關心奢華的定義、販售奢侈品的商人是否應受譴責，以及奢華是否可能會讓國家變得羸弱頹廢。上述現代學者在討論笛福經濟思想時多傾向於單獨處理笛福的經濟思想，也因此至今研究成果中，將笛福放在當時英格蘭思想圈針對奢華的辯論之脈絡中的專書或是論文寥寥可數。本文的一個目的便是補充此不足之處。

本文在接下來的第二部分首先將簡要回顧十八世紀關於奢華的辯論，並以曼德維爾與笛福為中心展開討論。第三部分則將圍繞《全書》為中心探討笛福對於奢華的定義，以及他如何辯護適度奢華的必要性以及正當性。第四部分則以實例探討貿易、奢華、邪惡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中間細緻的差別與界線何在。第五部分則是探討笛福如何以文明之進步來替奢華辯護。一個社會在生活之富足以及精緻化，也象徵了該社會已經在文明上進入了更高之

---

<sup>8</sup> John Robert Moore, *Daniel Defoe: Citizen of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Maximilian E Novak, *Economics and the Fiction of Daniel Defo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76), 42; Bram. Dijkstra, *Defoe and Economics: The Fortunes of "Roxana"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7).

<sup>9</sup> Thomas Keith Meier, *Defoe and the Defense of Commerce* (Victoria, B.C.: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Dep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87); James E. Hartley, "The Chameleon Daniel Defoe: Public Writing in the Age before Economic Theory," in *Money, Power, and Prin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British Isles*, eds. Charles Ivar McGrath and Christopher J. Fauske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26-50.

階段。結論則指出笛福的論點與其他同時代思想家相比之下的原創性為何，藉此能更清楚闡述出笛福在十八世紀思想世界中的地位以及貢獻為何。

## 二、十八世紀初關於奢華的辯論：以曼德維爾與笛福為中心的討論

歷史學家目前一般將社會中出現大量消費產品的時間追溯到 17 世紀末和 18 世紀。隨著奢侈品在社會中的頻繁出現和佔據主導地位，很多人開始擔心奢侈品對社會的影響。在傳統觀念中，過度奢華削弱了德行，腐化了國家。作家們開始思考如何在積累財富和國家的興衰之間取得平衡。一些思想家擔心歐洲國家會遭遇與羅馬人類似的命運，因為他們認為奢華和生活愈加便利的代價是公民精神的惡化，這將進一步導致道德腐敗和國家衰落。其中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是法國大主教費內隆。他是路易十四時期科爾伯特經濟政策的批評者，同時是對於奢華的著名批評者。他的《特勒馬庫斯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Telemachus, son of Ulysses*)於 1699 年出版之後成為當時乃至於十八世紀法國銷售量最高的作品，而且英文翻譯本很快便在倫敦印刷發行。他透過此寓言故事警告讀者，奢侈品的出現將取代符合自然規律的自給自足狀態，讓人類陷入己身慾望和貪念的無盡放縱。費內隆因此提議法國應該要進行改革，禁止所有奢侈品藉此遏制其腐敗的影響力。費內隆關於禁止奢華的建議獲得了許多迴響，許多人皆同意他所說的奢侈品將會取代人類本應滿足的自給自足狀態，會讓人沈溺於不合乎自然的放縱慾望。費內隆的影響力也表現在，日後許多英格蘭文人在討論奢華議題時皆受到費內隆影響，試圖要回應他的論點，例如查爾斯·達文南特(Charles Davenant, 1656-1714)、伯納德·曼德維爾。<sup>10</sup>

英格蘭關於奢侈品的爭論與法國一樣皆於十七世紀下半葉開始升溫。當時英格蘭開始頻繁接觸與消費來自亞洲與美洲的物品與資源。這些物品雖然

---

<sup>10</sup> Richard Whatmore, "Luxury, Commerce,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James Ha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75-595.

帶給了人們在生活更多的舒適與享受，但是當代人也對於這種消費模式的變化，無論是其原因與後果都感到焦慮。奢華問題對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在道德上提出了巨大挑戰：信奉古典價值觀的作家認為奢華乃是萬惡之源，將會削弱國民的德行，並且讓國家腐化。例如杜德里·諾斯(Dudley North, 1641-1691)在 1669 年的著作中便寫道：追求「高尚生活」的品味感染了貴族和紳士，讓他們誤以為放縱「自愛」是一種「巨大的幸福」。但其實這只會導致懶惰、浪費和普遍性的「過分講究衣著」。而解決這種困境的方式則是要學習荷蘭人的節儉，以及他們在消費上的節制。在諾斯看來，這種做法為一個國家維持節制與強盛的關鍵。<sup>11</sup>

在討論英格蘭關於奢侈品的爭論時，許多學者將尼古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 c.1640-c.1698)稱為代表人物。他讚美奢華的必要性，宣揚「揮霍是一種對人有害的惡習，但是對於貿易則毫無害處」(prodigality is a Vice that is prejudicial to the Man, but not to Trade)。此外，巴本還指出了貿易的重要作用，因為現在貿易所帶來的財富已經成為國家之間要在戰爭中軍費的來源。可以說，哪個國家的錢多，對其在戰爭中取勝極為有利。<sup>12</sup>但我們不應誇大巴本的影響力，因為當代作家們，包括笛福在內，在他們的著作中鮮少引用與提及巴本之著作。達文南特方為笛福確實有閱讀並且加以回應的作家。達文南特曾告誡人們，奢侈品腐化、削弱了人們，使工人不適合勞動。他指出：「毫無疑問，貿易本質上是一種有害的事情；它引入了奢侈品這類財富；它會導致欺詐和貪婪，並且瓦解了風俗中的德行和簡樸」。<sup>13</sup>達文南特的這種擔憂具體體現了公民人文主義思想傳統中對奢華的譴責。在這種古典的思維框架中，奢華

---

<sup>11</sup> Dudley North, *Observations and Advices Oeconomical* (London: printed by T[homas]. R[oycroft]. for John Martyn printer to the Royal Society, at the sign of the Bell without Temple-Bar, 1669), 47, 65-68, 107.

<sup>12</sup> Nicholas Barbon, *A Discourse of Trade* (1690), in *Commerce, Culture, and Liberty: Readings on Capitalism before Adam Smith*, ed. Henry C. Clark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2003), 67.

<sup>13</sup> Charles Davenant,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 Part II*, ed. Sir Charles Whitworth, vol. 2,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Works of That Celebrated Writer Charles D'Avenant, LL.D.* (London, 1771), 275.

與腐敗，道德敗壞和軍事弱點聯繫在一起。<sup>14</sup>不過，已故的政治思想學者伊斯萬·洪特(István Hont, 1947-2013)指出，雖然達文南特有這樣的憂心與警告，但是他跟過去反對奢華的作家不同，他認為國家的富足乃是捍衛自由和國家德行的基礎，而在現代商業社會中奢華便是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現代戰爭之勝負並非由戰士的武勇、德行所決定；相反的，現在是財力最為深厚的國家，方有贏得勝利的最大勝算。<sup>15</sup>因此他已經肯認現代國家的強盛已經不再能夠脫離奢華存在。<sup>16</sup>任何對於貿易以及奢侈品不合時宜的干預都可能損害英格蘭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他認為不能回到英格蘭人先祖的生活方式，因為當代英格蘭人之所以能夠應付侵略，仰賴的並不是英格蘭的自然資源及其相關收入，而是依賴於貿易以及國民的勤勉(industry)。<sup>17</sup>簡言之，奢華雖然應該被保留下去，但是在達文南特的詞彙中它仍然是一個令人不快的概念。

洪特曾指出此時代對於奢華的辯論有雙重面向。第一重是今古之爭下的差別，爭論古典時代的簡樸節約與現代的商業擴張孰優孰劣，而第二重意義則是現代派(moderns)內部的辯論。現代派文人之間雖然有著擁戴商業貿易的共識，他們之間存在的最大爭論則在於奢華在政治與道德上是否具有正面價值。正如學者伯格和伊麗莎白·埃格爾所指出的，在整個十八世紀，許多評論人士對「新」奢侈品與「舊」奢侈品的崛起進行了區分。後者被認為是上層階級的一種簡單的浪費和奢華，而前者被認為是一種有益的影響，增加和擴大了勤勉(industry)和消費的範圍。<sup>18</sup>贊同有限度地享受奢侈品的作家像是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與喬治·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沙夫茨伯里便認為有限的奢華對

---

<sup>14</sup> Berry, *The Idea of Luxury*, 133.

<sup>15</sup> Paul Slack, *The Invention of Improvement: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ogres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6.

<sup>16</sup>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6-216.

<sup>17</sup> Charles Davenant, *An Essay upon the Probable Methods of Making a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lance of Trade* (London: printed for James Knapton, at the Crown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99), 209.

<sup>18</sup> Berg and E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xury Debates," 7-10.

於人民的生活水準有幫助，但是那些放縱過度的人必然會打亂他們的「自我系統」。這種過度消費在沙夫茨伯里看來其實是人類對於「自我的壓迫」。<sup>19</sup>柏克萊則是較之沙夫茨伯里更進一步地去肯認時尚(fashion)在人們追求華冠麗服時所展露出的無窮力量，不過柏克萊仍然認為政府應該要對於奢侈品和時尚產業加以規範監管，而不應該完全放任其自由發展。而在十八世紀這場辯論中，對於奢華採取最為開放的擁抱態度，也引起最多爭論的莫過於是曼德維爾的著作。

曼德維爾在其《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Bees*)中有一個臭名昭著的悖論，認為私人的罪惡成就了公共利益。這個悖論放在奢華的狀況中便是，精英階層消費奢侈品的這種「惡行」其實促進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繁榮。簡而言之，曼德維爾認為奢侈品能夠點燃經濟繁榮之火苗，並且認為個人之惡習與公共利益之間存在正向聯繫。他駁斥對奢侈品的追求會削弱一個國家國力的擔憂，相反的，他認為只有那些存在著活絡奢侈品貿易的國家，才會是經濟繁榮、工商業具有創新與創造力的國家。享受奢侈品不僅能夠讓人們生活更加文雅精煉，使用這些物品本身也就是這個社會具備一定文雅修養的證據。經濟活動規模與頻率的提升，使得人們必須互相交易往來，這反而加強了社會成員相互的依賴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因此，市民社會的秩序不僅沒有被奢華所破壞，反而還因此更加強化。奢華不僅滿足了人的自我利益，也讓社會上其他人過得更好。曼德維爾論證道，節儉是種「無用、空想的德行」(an idle dreaming Virtue)，無法讓人們的生活變好，也無法刺激各項產業的發展。相反的，若是有奢華產業，那麼窮人會因為虛榮心與嫉妒心而欣羨富人的生活，進而加以模仿，這會驅使「窮人工作並且刺激他們的勤勉……並鼓勵熟練的工匠尋求進一步改進。」而這個因為奢華所發展出來的產業結構，又進一步提供了窮人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sup>20</sup>

---

<sup>19</sup> 引自 Istvan Hont,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Debate on Commerce and Lux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ed. Mark Goldie and Robert Wok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7.

<sup>20</sup>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1, 130.

如上所述，曼德維爾強調十八世紀的當代已經邁入了商業社會，英格蘭社會已經無法回頭。若是要追求古典價值的禁奢社會，那麼英格蘭的國力將大幅倒退，因為為了保持人們的簡單樸素，人口必須維持在低水平，而且不能讓人民遭遇到任何陌生人或是見識到任何新奇之物。要言之，禁絕任何可能刺激他們慾望、或是改善他們生活的物品。<sup>21</sup>節儉固然是種德行，但是曼德維爾指出這卻也是種讓人們挨餓受苦的德行，只適合於在承平時代安貧樂道的小團體，但是在人口規模龐大，而且又必須支付對外戰爭軍費的現代國家而言，堅守嚴格的節儉而不願意接受奢侈品的存在合理性，那麼這個國家必然無法讓其居民享有安全舒適的生活。<sup>22</sup>另一方面，奢華雖然在眾人眼中是種罪惡，但是它所帶來的好處卻可以讓城市中絕大多數居民享受得到。曼德維爾指出對奢侈品的渴望是勤勉和商業的發動機，鼓勵國家製造業的發展，並使它能夠與外國進行商品交易。<sup>23</sup>此外，曼德維爾也理解古典思想中對於奢華將會腐壞軍隊與將領道德的擔憂，像是古羅馬留下的歷史教訓一般。<sup>24</sup>然而，曼德維爾指出商業國家的軍事財富不再依賴於所謂的古代共和德行。古典理想中認為堅守貧窮清苦有助於軍隊將領取勝，但是曼德維爾指出這種價值觀在現代社會中則變成了讓人一笑置之的「天真浪漫想法」。<sup>25</sup>因為在現代戰爭中，國家的軍事力量不再依賴公民的軍事武德，而是依靠可資購買武裝和支付軍隊薪餉的財政能力。

學者如約翰·羅伯森(John Robertson)和愛德華·漢德特(Edward Hundert)等人針對曼德維爾對同時代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伯克利和法蘭西斯·哈其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如何回應曼德維爾對該時代思想界所造成之衝擊，業已有豐碩之成果。<sup>26</sup>儘管笛福同樣針對奢華、時尚和人性著墨甚多，他所

<sup>21</sup>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1, 185.

<sup>22</sup>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1, 104-5.

<sup>23</sup>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1, 108-115.

<sup>24</sup>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1, 104-105.

<sup>25</sup> Bernard Mandeville, *Free Thoughts on Religion, the Church & National Happiness (1720)*, ed. Irwin Primer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285.

<sup>26</sup> John Robertson,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6-324; Edward J. Hundert, *The*

提出的觀點顯然是處於這場辯論脈絡之中，然而並沒有太多的研究試圖將笛福的學術與這場關於商業和道德的辯論聯繫起來。因此本節希望透過將笛福與目前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曼德維爾比較著手，透過對比看出笛福思想的特質。

笛福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人性中的自愛心(self-love)是不可能根除的。在十八世紀早期的英格蘭這樣商工品和商業繁榮的社會當中，要限制人們購買昂貴的東西和衣服無疑是緣木求魚。正如笛福所說：「你可以抑制他們的奢華，但你不能確保這樣就能抑制他們的驕傲之心。」強硬地禁止奢華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有害：「任何一種禁奢法都無助於改革這一惡習，而且它反而將損害國家的商業」。<sup>27</sup>誠如上述，笛福認為這種過度自愛之心是根深蒂固在人性之中，因此無法根除；他所提出的實際的應對措施則是，正視這些不構成邪惡的揮霍行為之存在，及其對於經濟之重要性，並且警惕讀者們不要沈溺其中。

當代經濟史學者保羅·斯萊克(Paul Slack)主張曼德維爾影響了笛福，笛福所說「改造我們的惡習」將「毀滅這個國家」的論點就是從曼德維爾引申而來的。斯萊克用笛福的例子來論證奢侈品在十八世紀英格蘭正在逐漸地被輿論界所接受，因為它促進了國家之整體進步。<sup>28</sup>另一方面，摩爾堅持認為，儘管兩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笛福的最核心觀點與曼德維爾有顯著差異。摩爾引用笛福的一句話來支持這一觀點：「若是不加以停止這個時代的奢華，它將毀滅掉這個國家」。<sup>29</sup>不過，若是我們細看這句引文的上下文則會注意到，這裡所謂的奢華指的是兩件事：一是普通人早餐習慣的改變，從粥和牛

---

*Enlightenment's Fable: 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9-37.

<sup>27</sup>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II (1727), ed. John McVeagh, vol. 8,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212.

<sup>28</sup> Slack, *The Invention of Improvement*, 211-212.

<sup>29</sup> Moore, *Daniel Defoe*, 323. 這段引文出自 Daniel Defoe, *Augusta Triumphans* (1728), ed. W. R. Owens, vol. 8,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278.

奶變成了咖啡和茶；另一個指涉對象則是某些英格蘭人晚近所沈迷、濫用的一種名為「日內瓦」(Geneva)的杜松子酒。<sup>30</sup>笛福在其他著作中也指出，咖啡和茶在十八世紀英格蘭已經變成不可或缺的日常消費品，這種「奢華」顯然不構成危險。因此，笛福指出應該要防止的是過量飲用杜松子酒，咖啡則不應該被禁止。因此，摩爾所引用的證據，並無法支持他認為笛福的觀點與曼德維爾截然不同的論斷。

諾瓦克的經典著作也探討到了兩位思想家之間的關係。諾瓦克注意到笛福與曼德維爾的相似之處，不過他認為笛福仍然對於奢華消費抱持著懷疑態度，而與曼德維爾有著深刻不同。諾瓦克使用的證據是指出笛福批評假髮批發商以及糕點師傅，認為這些販售不切實際商品的商店損害了實際上更具有生產力的產業。<sup>31</sup>然而，在笛福的《全書》中曾兩次提及假髮商人。第一次是為了證明倫敦比起伊斯坦堡更為進步，用倫敦有無數家假髮商家作為證據。第二次則是用假髮行業的蓬勃來歌頌英格蘭人的新生活方式。笛福認為它們象徵著商業社會下的一種新生活方式，他是這麼寫的：

驕傲心的盛行給人們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使得最貧窮的公民努力模仿富人的生活、富人模仿鄉紳、鄉紳模仿貴族、而貴族們又努力使自己超越其他貴族，無怪乎關於奢華的各行各業都在增加。<sup>32</sup>(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十七世紀下半葉以前英格蘭的假髮並不是盛行，但是到了笛福寫作的這個時代，他指出在倫敦跟近郊之處的假髮製造商就有三萬名以上。更重要的是，假髮業之擴張並非是單獨現象，而是整體時代風氣、新生活方式的體現。同樣的趨勢也表現在馬車製造商數量的擴張上頭。過去倫敦城中可能僅有某個街區聚集了這些製造商，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初倫敦已經四處皆可見到製造商。又如，笛福父祖輩的英格蘭人是每週方換兩次襯衫，然而到了十八世紀，絕大多數紳士們一天更換兩次襯衫已經成為日常習慣，這恰恰反映出人的生活變得日益便利以及講究。<sup>33</sup>

<sup>30</sup> Defoe, *Augusta Triumphans*, 278.

<sup>31</sup> Novak, *Economics and the Fiction of Daniel Defoe*, 138.

<sup>32</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33-34.

<sup>33</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34.

至於諾瓦克提及的糕點師傅，笛福則是引用他們來稱頌英格蘭具備著豐富且多樣的食物，這正完美地說明了社會的進步以及繁榮。用笛福的話說便是，現今「許多行業都必須仰賴這些令人不快的商品」，<sup>34</sup>但這也無法支持諾瓦克所謂糕點業者傷害了其他產業的說法。此外，諾瓦克指出《論改進貿易之道》(*An Essay on Ways and Mean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rade*)這本小冊子乃是出於笛福之筆，並且藉此作為證據來證明笛福主張政府應嚴格監管奢侈品。然而，在眾多學者之中只有諾瓦克認為這本著作的作者是笛福。況且，笛福的其他著作中皆未主張要控制上層階級的品味和生活風格。

因此根據上文的詳細討論，笛福與曼德維爾兩位作家並不如這些學者所說的不同，我們接著便要更深入地辨明他們思想上的異同之處。例如，兩人都直言人類的自愛心乃是一個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笛福指出，這一點可以通過有多少人是受僱於滿足人類享樂慾望的產業中窺見全貌。<sup>35</sup>他們也一致認為，服務奢侈品消費者的僕人，以及提供消費者商品的商家不應受到指責。正因為每一個行業都有好人和壞人，所以批評者僅僅因為某些害群之馬，而全盤否定整個行業之價值與正當性並不公允。酗酒誠然是不當之行為，然而各種酒類之貿易、交易當中，也存在者許多勤懇的從業者。這些工商業者本身並未酗酒，但是他們的生計卻深深仰賴於過量飲酒的人們。要言之，墮落酒鬼的消費，其實默默地支撐著有著為數甚多的「酒商、搬運工、運輸者、僕人」、「酒吧、客棧老闆」的生計。<sup>36</sup>

笛福便是以酒類行業商人為例來為這些從事奢侈品行業的商人提供了類似的正當性和辯護。笛福根據酒精製造與消費的行業指出，作為原料的葡萄和麥芽本身並無邪惡之處，甚至烈酒和啤酒這些產品也是無害的，重點在於消費者的適量飲用與享受。此外，出售啤酒和葡萄酒的商店對於酗酒行為並不須擔負責任，因為過度飲酒的人們並不是受到他們之脅迫。笛福還贊揚說：「蒸餾酒行業的改進和擴張，大大增加了我們國家商人的數量，甚至有

<sup>34</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5.

<sup>35</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1.

<sup>36</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9.

一些新的行業隨之興起。」<sup>37</sup>笛福提醒我們，在商業社會，我們不應該期待小店主、商人必須要是一名誠實、完美的人。

不過兩位作家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區別，那便是曼德維爾對有爭議的觀點幾乎毫無保留，完全不加但書；而笛福則經常補充一些安撫人心的言論或額外的解釋來緩和論點。例如，曼德維爾在他的淡啤酒(*small beer*)寓言中，諷刺了那些顯然喜歡喝酒，但又不敢坦承自己喜歡杯中物的人。他們於是找了個藉口，說喝酒對他們的膚色有好處，而不是沈迷於酒精的麻痺效果。曼德維爾認為，每個人都喜歡喝酒，但由於虛偽之故，所以那些敢於表現出自己就是性喜用酒精解渴的人會被指責為醉酒。然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曼德維爾從未說過酗酒是件好事，他所要澄清的是每個人在心中其實都享受飲酒，那麼道德作家們不應該閃避或是遮掩這件事情。在同樣的問題上，笛福的討論方式並不像曼德維爾那樣尖銳。笛福反覆強調，喝酒行為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是他經常加上但書道自己的前提是人不應該酗酒。此外，笛福也並未像曼德維爾那樣斬釘截鐵般地主張喝酒與道德無關。另一方面，笛福雖然反對酗酒，但是既然喝酒是無法被禁絕的事情，他也認為最為實際的作法則是去鼓勵或規定英格蘭人應該要喝本地的啤酒，而不是法國生產的葡萄酒。這種做法一部分是出於國家出超入超的考量，另外一方面則是笛福認為英格蘭酒的品質優於法國酒。笛福這種對於酒精飲品的接納以及提倡之論述，在同時代的作家之中，除了曼德維爾以外，也很難可以找到類似的評論。

根據以上對於笛福與曼德維爾的比較可以歸結出幾點，首先笛福對於消費和奢華的看法可以說是曼德維爾說法的修正版本，又或者說是將曼德維爾的主張以世人較為能夠接受的方式之通俗化版本。例如對於咖啡或是茶的享用，曼德維爾在其論述中會將這種享用稱呼為奢華，甚至是惡行(*vices*)，但是笛福則是將其更為精緻地分梳，指出咖啡、茶與杜松子酒等酒類在性質上不盡相同，前者是一種讓生活變得更舒適之適當提升。這也凸顯出笛福相較曼德維爾對奢華的更務實與深刻之評述。

---

<sup>37</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198.

### 三、笛福對於奢華的定義以及合宜消費的思考

在探討笛福關於奢華與道德之間辯證關係的研究中，學者漢斯·安德森 (Hans H. Andersen) 的論文雖然發表於七十年前，不過直到今日仍被廣泛引用，因此在這裡仍有簡要回顧之必要。安德森的主要論點是：對於笛福而言，商業是一個獨立於固有道德價值的領域，因此一般常見的道德標準在此領域中並不必然適用。正也是因為如此，笛福可以容忍某些違反道德教條、宗教規範的商業行為，所以安德森主張笛福思想中存在著這個矛盾。換句話說，他認為笛福為了獲利的目的，會願意犧牲他在道德上的某些主張。<sup>38</sup>安德森的一個證據是笛福對奴隸制的態度：笛福基於其道德觀上對奴隸所遭受的殘酷感到天人交戰，但是安德森認為，笛福基於對奴隸制背後龐大經濟利益之考量，最終仍選擇支持奴隸制。

然而，廢除奴隸制度的主張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開始在英格蘭出現，在十八世紀初時奴隸制度對絕大多數英格蘭人而言並非「不道德」的行為。這種態度並無法支持安德森所謂笛福選擇性地無視自身道德觀而支持奴隸制度。一名學者便指出，「雖然在二十世紀提倡奴隸制在社會上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在十八世紀這樣做是可以被社會接受的」。<sup>39</sup>況且，笛福在其他著作中也曾以經濟利益為理由批判苛待奴隸的殘忍作為，不過他這種奴隸主應該善待奴隸的主張，是出於經濟考慮而非出於人道考量。<sup>40</sup>這因此便與安德森所謂笛福為了追求商業利益選擇犧牲自身道德觀的論點並不相符。

與本文最為相關的部分自然是關於奢華的討論。安德森認為笛福在其眾多著作始終有個核心關懷，那便是英格蘭的國家利益。因此，他用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等理由，來替酗酒、咒罵髒話等等在道德意義上的錯誤行為辯護。安德森這麼解釋的證據是笛福以下這段話：「風俗習慣的確在許多方面驅使

<sup>38</sup> Hans H. Andersen, "The Paradox of Trade and Morality in Defoe," *Modern Philology* 39, no. 1 (1941): 37-39. 參見 Sandra Guardini Vasconcelos, "Robinson Crusoe in the South," *Aletria: Revista de Estudos de Literatura* 31, no. 2 (June 2021): 23-43.

<sup>39</sup> Meier, *Defoe and the Defense of Commerce*, 81-83.

<sup>40</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6, ed. John McVeagh. 9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245.

我們逾越了道德界限……就算人因此必須要……欺騙他的鄰居」。<sup>41</sup>此外，安德森認為，笛福對利潤的關注讓他力主「商人不應受道德約束」。<sup>42</sup>不過，笛福從未主張商人不必要受到道德限制。例如，他認為出售酒類的商家不可以為了賺錢而無止盡地提供顧客酒類，他們不應該服務那些已經喝醉的人。他認為真正造成負面影響的不是飲酒行為本身，而是飲酒過度，以及在並非必要場合的飲酒。儘管笛福曾指出只要人們不賒帳，他們所購買的東西就不應該被嚴格限制，不過從他對於酒類買賣以及酗酒問題的苦口婆心勸阻，正也反映出他對於飲酒問題的憂慮。<sup>43</sup>因此，雖然笛福坦承商人在商業世界中為了生存，有不得不銷售酒類等商品之必要性，但是安德森主張笛福從未在商業中考慮道德問題則是不正確的。

透過檢討安德森論點的正確與不足之處，本文指出在笛福對奢華的探討中，道德與商業兩者並不存在非黑即白的關係，其中有許多必須透過細緻論證方能釐清之處。此外，由於十七世紀末以來英格蘭商業蓬勃發展，英格蘭國內已有有眾多人的生計皆仰賴於消費產業；此時若試圖強行將國家的經濟模式回歸到節衣縮食的儉樸生活，勢必將造成許多人流離失所，甚至窮困潦倒。笛福對於新商業時代方出現的這些問題有著縝密的思考，他看似互相矛盾的諸種說法事實上是為了回應不同的主題而發，而不全然如安德森所言自相矛盾。以下將先探討十八世紀文人對於奢華的辯論，以圖理解笛福想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與其他思想家的異同。

根據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在笛福所處的十八世紀初期，眾多思想家們已明確地意識到奢華的興起及其影響力。除了曼德維爾等少數作家之外，多數文人對其採取懷疑或是排斥的態度。接著我們探問的根本問題在於笛福認為什麼是奢華，而什麼不是？過去學者針對笛福對奢華的看法一直是眾說紛紜（見前言），以下兩節將說明笛福對奢華的看法又可以分為可接受的奢華以及應

<sup>41</sup>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I (1725), ed. John McVeagh, vol. 7,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186.

<sup>42</sup> Andersen, "The Paradox of Trade and Morality in Defoe," 44.

<sup>43</sup> Daniel Defoe, *Some Objections Humbly Offered* (1729), ed. W. R. Owens, vol. 8,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297-298.

受譴責的奢華，而過去學者之所以爭論不休便是出於兩者被混淆所致。本節將先討論笛福對於奢華的具體定義，以及他認為可以被接受的奢華的具體內容為何。

笛福對奢華的定義是「生活中的過度，例如……對貿易是必要的，但是對人類的生存是不必要的」物品。<sup>44</sup>他指出，若是要以最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何謂奢華的話，甚至在當時英格蘭頗為常見的香料也應被歸類為奢侈品，因為香料並非是人類維生的必需品。一個國家的生活必需品，以最嚴格的標準而言，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從另一個國家購買。<sup>45</sup>笛福認為，如果僅僅要讓人類維持生命，那麼生活中有許多事物都是不必要的，不過這麼作的話，也會讓英格蘭人的生活倒退到與美洲土著的生活方式一般：

他們的房子是可移動的小茅屋；他們那裡的食物是野獸，他們能殺死多少就能吃多少；弓箭、鋒利石頭或棍棒是他們的武器；火是他們最好的助手。<sup>46</sup>土著的生活方式使他們免於犯罪，因為他們什麼也不貪圖。他們沒有錢，因為錢對他們毫無用處；他們沒有東西可銷售，同時也沒有購買慾望。<sup>47</sup>顯然，這與笛福所處的時代不同，像英格蘭這樣的商業社會不應該，也不可能倒退回漁獵社會。

笛福正視人性中對於享樂的喜好，他也不希望去污名化那些「人們喜歡的享樂」。<sup>48</sup>笛福對奢侈品的論述既不像達文南特或柏克萊那樣深受羅馬歷史傳統以及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的影響。<sup>49</sup>以笛福對於迦太基的解釋為例，在羅馬作家西塞羅看來迦太基只關注貿易，導致了奢侈、閒散和腐敗，而這些也隨著羅馬征服他們傳染到了羅馬城，也造成了羅馬共和性格之改變，

<sup>44</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7.

<sup>45</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6.

<sup>46</sup> Defoe, *Defoe's Review* 3, 587.

<sup>47</sup> Defoe, *Defoe's Review* 3, 588.

<sup>48</sup> Defoe, *Defoe's Review* 3, 94.

<sup>49</sup> Scott Breuninger, *Recovering Bishop Berkeley: Virtue and Society in the Anglo-Irish Contex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74.

並且是羅馬衰弱的根源。<sup>50</sup>然而，笛福在討論迦太基之高度商業成就時，從未提及奢華所可能帶來的腐化危險，相反地，他欽佩迦太基作為推動世界貿易的先驅，並且指出他們是英格蘭人應當效法的榜樣。<sup>51</sup>

那麼，為何笛福在說到奢侈品或是像是咖啡、茶葉等供人們在生活中享受的商品時，為何卻時常稱其為惡習呢？從笛福自 1700 年代至 1720 年代的眾多著作可以看出，他一貫地支持咖啡與茶並非任何罪惡的根源，並且是當代英格蘭人可以心安理得享受之物品。笛福寫道，在當代像是茶、咖啡，又或是塞維亞(Seville)的橘子、馬拉加(Malaga)的檸檬

這些東西主要是用於生活中的進一步享受，我們稱之為貿易上的必需品，但是對於人類之生存並非是必要的……我們的航海貿易是要在全世界各地買賣奢侈品，由於這促進了貿易總量，因此現在開始被視為對於公共利益也有幫助。<sup>52</sup>

另外，笛福還誇飾地說由於必要性與習慣之改變，現在英格蘭「整個民族幾乎都或多或少了犯了罪」，犯下了「各式各樣之惡習」(general vice)，但是當我們進一步端詳其內容，則會注意到所謂的惡習指的是較過去更為優質，且數量更多的「生絲、棉布、巧克力、咖啡和茶」。<sup>53</sup>但是還是有人認為茶、咖啡都被視為是「促進了惡習」(propagating vice)。但是笛福反問道，假設真的按照這種批評方式來強力驅逐所有非生存必須之消費，那麼這將「減少國家之收入，也摧毀了許多人之生計」。<sup>54</sup>他否認這樣會是較好的做法。

<sup>50</sup> Bruce Buchan, "Changing Contours of Corrup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c. 1200-1700," in *Corruption: Expanding the Focus*, ed. Manuhua Barcham, Barry Hindess, and Peter Larmour (Canberra: ANU Press, 2012), 75.

<sup>51</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ed. P. N. Furbank, vol. 4,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52-53.

<sup>52</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7.

<sup>53</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 108.

<sup>54</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4, 207.

#### 四、貿易、奢華、邪惡之間的辯證關係

回歸到笛福之所以稱呼這些他認為必要的商品消費之所以為惡習，更有可能的一種解釋是笛福迫使讀者接受過去對「惡習」(vices)之所指物朝價值中立化的方向轉變，先從讀者們相對習慣、熟悉的語言來向他們商榷與灌輸新的思考面向。笛福對於這種語言的熟悉來自於他的清教徒背景，而且他在從商以前曾經就讀於專門培育不服從國教新教徒(the Dissenters)牧師的紐因頓格林學院(Newington Green Academy)；笛福的《全書》也系統地展現出清教徒思想的重要特質。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他的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十七世紀的加爾文主義和清教主義體現了新教倫理的基本原則，例如人們檢驗自己是否為上帝的選民的唯一方法，便是透過不間斷地規律勞動。例如韋伯引用了《箴言》(Proverbs)二十二章二十九節「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嗎？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來論證唯有殷勤的人能站在君王身邊，而這也是清教徒的典型信條。<sup>55</sup>笛福在《全書》同樣地引用了這段話來陳述商人所應該追求的勤勉價值。<sup>56</sup>此外，笛福也相當熟悉其他清教徒作家經常引用來規勸讀者勤勉的《聖經》段落。像是所羅門在《箴言》告誡商人當勤奮工作：「殷勤的手，使人富足。貪愛宴樂的，必致貧窮」；<sup>57</sup>以及「好酒貪食的，必至貧窮；好睡覺的，必穿破爛衣服」。<sup>58</sup>

此外，韋伯還強調，明智地利用時間是他們職業道德的一個特點。這種對時間的明智利用的強調是十七世紀英格蘭清教徒的顯著特徵。和笛福在同

<sup>55</sup>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19.

<sup>56</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 61. 清教徒作家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Steele, 1629-1692)在他的著作《虔誠商人》(*Religious Tradesman*)中同樣引用了這句話作為對懶惰的警告。Richard Steele, *The Trades-Man's Calling: Being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Nature, Necessity, Choice, &c. of a Calling in General: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ight Managing of the Tradesman's Calling in Particular*. (London, 1684), 53.

<sup>57</sup> 《箴言》10章4節，笛福引用這段經文的著作見：Defoe, *CET 1*, 66.

<sup>58</sup> 《箴言》18章9節、23章21節。笛福引用這兩段經文的著作見：Defoe, *CET 1*, 64.

間學院學習過的牧師約翰·蕭爾(John Shower, 1657-1715)強調了明智利用時間的重要性。蕭爾說：「我們要善加考慮我們所擁有的光陰，使我不至於拖到時間的盡頭來知道它的價值。當上帝給予我時間時，我不應低估其價值；這麼一來當時間不復存在時，我便不會到那時才對自己的愚蠢後悔莫及」。<sup>59</sup> 另一名不服從國教新教徒牧師奧利佛·海伍德(Oliver Heywood, 1630-1702)也寫道：時間「是一種非常寶貴、不能低估的商品……它就是一條上面掛著永恆時光的金鍊；時間的損失是無法被挽回的，也因此不應該被容忍」。<sup>60</sup> 笛福對這一傳統也很熟悉，他也認同商人對待自己所擁有的時間也應該像記帳一般地嚴謹，他這麼寫道：「時間若是沒有被妥善運用，就跟被虛擲沒有兩樣。」<sup>61</sup>

笛福對於善用時間的關注，同樣表現在他探討商業的著作以及商人指南之中。他認為，對於一個負責任的商人來說，有兩件事是他們必須警惕的：其一是「宗教的職責，或與未來生活有關的事情」，另一個是「當前生活的職責，即職業和使命」。<sup>62</sup> 笛福警告讀者說，如果一個人沒有明智地把握時間，那麼當他在人世間的短暫時間結束之後，就將迅速被世人所遺忘。<sup>63</sup> 笛福在《全書》中告誡讀者道：人不可以虛擲光陰，也不能讓自己的生命徒勞無功。他將掌管國家信貸的官員比作鐘錶上的「彈簧和齒輪」，用來強調他們必須要守時以及公正。<sup>64</sup> 筆者在此不擬作詳細討論韋伯關於清教倫理的命題，不過上述的證據則清楚呈現出笛福對清教徒典型思想的熟悉，而這也是他稱呼奢侈品為邪惡之物的思想脈絡。

<sup>59</sup> John Shower, *A New-Years-Gift: Containing Serious Reflections on Time, and Eternity* (London, 1699), 29.

<sup>60</sup> Oliver Heywood, *The Whole Works of the Rev. Oliver Heywood*, vol. 5 (Idle: John Vint, 1826), 575. 引自 E. 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no. 38(December 1, 1967): 87.

<sup>61</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 67.

<sup>62</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 61.

<sup>63</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124.

<sup>64</sup>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Publick Credit* (1710), ed. John McVeagh,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55.

儘管笛福在《全書》中建議商人自身應該盡可能地量入為出，過著與享受奢華相反的節儉生活，<sup>65</sup>但是他很清楚人類的天性被自傲、自滿等慾望所主導，人若是有閒錢的話必然會想要購買奢侈品來享受，這種慾望在他看來不可能被消滅。<sup>66</sup>因此，笛福固然叮嚀商人在個人私生活中應該要克制慾望，不應將私人積蓄花費在奢侈品上；但是在嶄新的商業時代裡，商人在商場上則必須也應該投入奢侈品的製造與銷售之中，而沒有逃避的餘地和可能。笛福直言，若是現在將貿易所帶來的奢侈品從英格蘭社會中移除，那麼這個社會將退化到原始狀態，人民的生活將變得毫無樂趣與缺乏驅動力。<sup>67</sup>從上述的說法中，我們可以清楚觀察到笛福在論述道德時的兩難與矛盾，但是他認為國家或社會經濟發展應該高於對道德的追求。他認為因為有大量的酒類消費，才能支撐起許多酒商以及酒館之生計：

國家因此才能夠獲得大量稅收，也因為有這些人，大量的麥芽與食物方得以被消化。一言以蔽之，這是我們**全體商業的命脈**(the life of our whole commerce)，而且必須仰賴消費者的數量。他們的人數不是數百或數千，也不是數萬，而是數百萬；我認為正是因為消費的人數眾多，國家之貿易齒輪方得以能夠轉動，我國無論是陸上或海中的各種資源與手工製品方得以被開採利用，並且被銷售至適合的國外市場。<sup>68</sup>(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另外一本書當中，笛福也指出由於奢侈品、消費能夠刺激經濟發展，因此不應該用嚴格之道德標準來加以限制。笛福指出，若是以最為嚴格的標準來要求商人在談話中不可以有任何一句謊言，或是人與人之間「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sup>69</sup>這樣子商業、貿易將會全面萎縮，而許多人將會因此失業而流離失所。況且，若是英格蘭人們要改以這種標準來處世的話：

<sup>65</sup> Defoe, *Defoe's Review* 3,55.

<sup>66</sup> Laurence Dickey, "Pride, Hypocrisy and Civility in Mandeville's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eory," *Critical Review* 4, no. 3 (1990): 409.

<sup>67</sup> John McVeagh,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leat English Tradesman*,"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22.

<sup>68</sup> Defoe, *An Essay upon Publick Credit*, 178.

<sup>69</sup> 此句話出於《希伯來書》(The Hebrews)13章5節。

我們甚至必須要停止交談，因為在當今的日常生活交流中總是充滿了謊言，  
無論是餐桌上或是商場上，沒有一個人會對他的鄰居全盤說真話。<sup>70</sup>

要言之，笛福盱衡現實狀況後，指出最好的做法是正視奢華之存在，並且設法讓人不要放縱這些自愛過度膨脹。此外，一種最為妥善的做法便是社會領袖以及官員應該要設法設計出讓人們在追逐奢華的同時，不知不覺地促進整體社會利益的機制。

誠如上述，笛福在奢侈品中間又分出可以接受以及不能夠妥協的部分。我們必須注意笛福在使用「惡習」一詞時的具體意義。例如他說「為了鼓勵我們的商業貿易，我們必須鼓勵我們的惡習。」根據這句話的上下文脈絡，笛福這裡指的惡習是穿戴搭配著「刺繡」(Embroideries)和「花邊」(Laces)的精美衣服。<sup>71</sup>因此，笛福之所以稱呼這兩類衣物是種惡習，其實是借用當時約定俗成的慣用語，但是笛福顯然並未將其與奸擄燒殺的純粹罪惡等而觀之。

簡言之，笛福稱呼那些超出人類生活基本所需的物品，那些能讓人過得更加便利舒適的物品為惡習。我們在此必須要分別清楚，笛福所說的惡習究竟是一種修辭或者是在道德上應當被譴責之物。當笛福說到用英格蘭羊毛所編織出的衣物，或者是生活在比古代更為堅固、舒適的房子是種惡習時，他很顯然將這個詞以文學修辭來使用。在笛福的寫作生涯中，英格蘭羊毛產業的發展始終是他的核心關懷，並且強調乃至於歌頌此產業對英格蘭經濟的重要性。因此，若是將笛福這裡所用的邪惡一詞解釋成為道德上的罪惡，這顯然與笛福在其他著作一貫表述之立場扞格不入。因此，我們可以說，他用惡習來稱呼商業發展、奢侈品發展，其實既是一種誇飾筆法，亦是在呼籲人類不應只停留在褐衣疏食階段。

現代學者邁耶已透過分析指出，笛福所謂的奢華惡習一詞主要指的是過度放縱，而不是違背法律之犯罪行為。<sup>72</sup>邁耶的論證確實具有一定說服力，不過本文則要進一步指出，笛福思想中被學者忽視的線索是他的人性論與奢華的關係。他與曼德維爾一樣深諳驕傲(pride，在此傳統中則指極度自愛)在人

<sup>70</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 186.

<sup>71</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11.

<sup>72</sup> Meier, *Defoe and the Defense of Commerce*, 88.

心中的主宰地位。他對奢侈品的解釋堪比曼德維爾的「可憎的驕傲」(odious pride)。<sup>73</sup>曼德維爾認為這種出於惡意的可憎驕傲，反而創造了就業機會，而笛福也認同。他曾經寫道與曼德維爾非常相似的評論：

既然我們的罪惡在交易中必然變成德行，我們就必須讓那些被稱之為多餘的東西成為交易中的必需品；顯而易見的是，當一個人開始大刀闊斧改革這個國家人們所共有的惡習和奢華，也就是我們貿易被傷害的開始；當這種改革使我們成為聖人般的時候，也必定是我們成為乞丐之時。<sup>74</sup>

在另外一本著作中，笛福也清楚地呈現給讀者，奢華如何促進公共利益，以及其對於傳統道德之衝突：

我們的航海產業主要是用於購買生活中之種種用品，我們也稱之為貿易上的必需品；但其中大部分對於人類的生存而言不是必要的，也不是為了人民的福祉……[奢侈品]現在已都被認為是對於公共利益而言的非凡優勢，因為它們增加了貿易；因此，促進奢侈品貿易現在成為鼓吹商業的合理藉口，但是也傾向於去直接鼓勵惡習。<sup>75</sup>

笛福意識到他所處的時代已不同於過去，他對奢華的定義也不像「過度放縱」那麼簡單。相反，他認為，人們再也不可能對奢侈品視若無睹。他列出的「邪惡」奢侈品的具體內容，其中包括國與國之間的股票交易、購買印度製棉布或法國玩具等。這種「犯罪」與盜竊罪、殺人罪在本質上有著根本區別。在這裡，形容詞「惡毒」似乎是一種修辭。為了強調對英格蘭人的利益，這種商業貿易的進行已不可避免。就像在《全書》中討論商人信用(credit)的部分，笛福將商人之人品與其在商場上的信譽區分開來，就如同他將奢侈品的銷售人員與購買者區分開來一樣。他說：「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名徹頭徹尾的無賴……但是在商場上卻是位信用無可挑剔的商人」。<sup>76</sup>而且，這樣一位品性惡劣但是在商場上信用優良的人，在商界會廣受歡迎，因為在商業社會中人們所看重的特質是，與自己交易的人是否遵守約定與法律，而不是交

<sup>73</sup>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1, 25.

<sup>74</sup> Defoe, *Defoe's Review* 8, 820.

<sup>75</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7.

<sup>76</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106.

易對象的人品。笛福也因此認為在商業貿易的世界當中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誼，因為人人在此世界中皆戴著面具隱藏自我；也因此，人在商場上放縱自己的情緒不僅全無好處，甚至是有害的。在笛福對於商業社會的規劃當中，人與人之間應該戴上面具，不輕易表露情緒，這才是真正的文雅與禮節。<sup>77</sup>

更為現實的是，既然十八世紀初的英格蘭已經進入到了商業時代，人們的性情也已隨之轉變，這早已不是政府執行禁奢法或是加重關稅就可阻止之潮流。笛福清楚英格蘭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時代，便訴諸於天意論來論述此轉變，指出生活中那些不必要的東西都是「明智的神恩」(the Wise Providence) 賜予的。<sup>78</sup>笛福認為人類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滿足最基本的食衣住行需求，上帝希望讓我們過一種更為舒適的生活，而其中充滿了「樂趣和便利」。<sup>79</sup>

為了使讀者相信商業社會的價值，笛福以商業不發達的土耳其社會為例。笛福寫道，在土耳其，只有貴族才穿戴漂亮的衣服，那裡的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則普遍低落。由於此地沒有發展出奢侈品產業，對於工人的需求相對不大，許多人也因此找不著工作。他觀察到由於伊斯坦堡的酒類產業並不發達，所以在那兒幾乎看不到「麥芽酒製造者、釀酒商和他們所雇用的僕人」，而且「以酒維生」的人更是屈指可數。<sup>80</sup>笛福解釋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窮人生活得很好」，而他們那邊的窮人卻過著悲慘生活；這也支持了他的觀點，即當代人心中的「過度驕傲」(extravagant pride)助長了貿易，進而提升了英格蘭社會中下階層民眾的生活水準。<sup>81</sup>

笛福強調自己所提倡的奢華並不是會讓使用者變得羸弱，或是讓社會走向墮落的那種奢華。相反，他所提倡的奢華是指能讓人們生活得更舒適的那些商品與風俗。因此，奢華除了是消費品之外，還涉及到社會上人們的行為以及互動；奢華因此被愈來愈多人視為是一種城市的社交活動，無論是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皆參與其中。<sup>82</sup>這在土耳其非商業社會的生活方式中是顯而

<sup>77</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 96-97.

<sup>78</sup> Defoe, *Defoe's Review* 9, 216.

<sup>79</sup> Defoe, *Defoe's Review* 6, 187.

<sup>80</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08.

<sup>81</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11.

<sup>82</sup> Berg and E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xury Debates," 13.

易見的。按照土耳其社會的標準，普通英格蘭家庭所享用的食物比起他們的「精緻飲食」都還要高級。笛福認同大多數人都能過上好日子的社會，比起刻苦的社會要來得進步以及文明。如果英格蘭要在這個時代生存下去，就不可能要國民在生活中縮衣節食，僅能使用那些僅能維持基本生活的「生活必需品」。他反覆強調，因為這個時代不同於前一個時代，所以「那個時代的過分行為」是不能立刻否認的。相反，人們必須採取不同的思維來適應這種新的生活方式。

儘管笛福在描述這個新時代的消費習慣不時會使用惡習或無節制(excess)等詞語，但從他的寫作風格來看，他對這一發展實則感到自豪。例如，笛福記錄下倫敦這個城市不斷地在膨脹擴張，用各種大規模的數字像是「二十萬夸脫(quart)麥芽酒……一萬五千桶蘋果酒……五萬噸葡萄酒」來加以形容。<sup>83</sup> 笛福對於倫敦的這種驕傲，和認為節儉意味著自我否定的曼德維爾頗為相似，誠如後者所言：就算將「所有的重要德行(Cardinal Virtues)加總在一起，就還是連一件像樣的外套或一碗粥都買不起」。<sup>84</sup>

## 五、奢華與文明：富而好禮的商業社會

笛福認為，一個已邁入商業時代的社會跟一個非商業的社會，除了是在經濟手段有所區別以外，其實這也象徵了它們處於不同的文明階段。而在一個先進的商業社會中，人的生活必需品已經不僅僅僅限於食物、衣服等等，而是需要在生活當中的「樂趣和便利」都應該要更為發達。假如政府要以高壓手段強迫這個社會倒退到原始社會之狀態，並且限制人們的活動等等，那麼將會「破壞貿易、減少就業人數、讓工業衰敗並且使得國力衰弱」。<sup>85</sup>

就算在英格蘭本地禁止製造販賣例如絲綢等產品，有心者依舊會設法前往歐陸購買。如此一來，英格蘭的財富既流向海外，而且本地的產業也無法茁壯。笛福反問道，難道這種結果是那些主張將貴重金屬留在國內的作家們

---

<sup>83</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08.

<sup>84</sup>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1, 184.

<sup>85</sup> Defoe, *Defoe's Review* 4, 27.

所樂見？他接著主張，既然時代的潮流已經改變，而英格蘭又有如此多人仰賴於這些產業而生存，即便這些商業行為在嚴格定義下是惡習，但是卻有助於眾人之生計。笛福在離開不服從國教新教徒學院之前本是預備擔任牧師，他因此深諳清教徒式語言。此外，許多當代作家亦焦慮地指出，商業、娛樂、甚至是少量飲酒都是罪惡的。笛福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很自然地稱奢侈品為「惡習」。但是從笛福探討奢華的許多著作來看，很明顯笛福並不認為奢侈品是邪惡的。對惡習究竟是指「過度」或是「邪惡」這兩種定義的混淆，在某種程度上是學者們認定在笛福的思想中，商業發展與道德之間有所矛盾的主因。

笛福希望英格蘭成為的不是褐衣疏食的聖人之國，而是豐衣足食的強盛國家。此外，如果全面禁止任何嚴格定義下的奢華，最有可能造成的是更多人失業以及窮困。笛福相信倉廩足而知榮辱的道理，與其讓國家貧窮到國民必須鋌而走險求取生存，他認為不如在在惡習上維持些許妥協空間，以先富後教的態度來治理國家。正如曼德維爾曾指出，在一件毒殺案件中，藥商(druggist)不應該，亦不需要為此案件負責；同理，刀具商(sword-cutler)也不應要為用刀殺人之罪行負責。笛福也指出與曼德維爾相似的類比，像是販賣酒類飲料或是精美服飾的商人並不是造成奢華日益浮誇的始作俑者，要負起最大責任的人其實是那些使用者本身。笛福寫道：

商人可以在自身利益與其顧客之間看到一種公正的的不偏不倚；如果顧客進來店裡要求他用某種材料來製造某種物品，並且指定特定形式，那麼商人有責任遵從他的指示。至於其中的鋪張浪費則是花花公子(fop)所強加在他身上的。商人在自身利益和顧客之間可以找出一種不偏不倚的公正作法：如果買主到店裡要求他出售各種商品，或是要他製作各種形式的特殊商品，他就有責任去做。至於鋪張浪費則是富人強加給他的。<sup>86</sup>

笛福認為奢華是英格蘭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它被強行禁止或消滅，這將削弱英格蘭的商業貿易，也會造成無數人失業而流離失所。<sup>87</sup>奢華或許

<sup>86</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26.

<sup>87</sup> Defoe, *Some Objections Humbly Offered* (1729), 299.

在嚴格道德定義上是種惡習，不過卻是貿易上的優點。<sup>88</sup>為了順應時代的改變，若是能夠妥善地利用較過往更為精緻的新商品，這其實便已不再是過去價值標準下的惡習。笛福甚至將此詮釋為上帝的旨意：「我們慷慨的造物主創造了最普遍的……(但是)許多無數的快樂和生活的便利」。<sup>89</sup>這些更為精緻的貨物 and 商品既然是上帝所賜與的，對於虔誠的笛福而言，也就代表著它們不會是純粹邪惡的。

笛福於 1706 年在其主編的雜誌《評論》中寫道，在現在的英格蘭貿易中，這些在嚴格道德意義上的惡性商品顯然已經成為了整個國家的必要商品。他指出，在現在這個時代，若是要維持許多英格蘭人的生計，這些奢華已經成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因此，政府當局面對這種處境，若是全面且嚴格地取締奢侈品，這將造成眾多人民喪失生計而流離失所(「我們有兩百萬人民完全依靠它生活」)，因此笛福說出了他的做法，應該是要「改革不禮貌的行為，而不是去扼殺貿易」。<sup>90</sup>換句話說，也就是人們要學著適當地使用這些奢侈品，而不應該越過適當的程度。不過所謂的適當、中庸有其模糊空間存在，因此以下將以實際的例子來說明，究竟笛福所謂的有節制的奢華的具體內容為何。

笛福在稱呼咖啡、蛋糕這些生活中隨處可見、且多數人皆可負擔的消費品時也都將其稱呼為奢侈品，但是他並不反對這些行業在英格蘭的發展。<sup>91</sup>他甚至願意為了商業的發展，呼籲教會當局應允許商人在禮拜日彈性上班，亦即讓他們禮拜儀式之前營業兩個鐘頭，以避免那些無法長期保存的食物的腐壞而造成浪費。他寫道，肉商「可以在早上天氣尚涼的時候宰殺牲畜，然後營業到九點」。<sup>92</sup>這是笛福對於商業現實與宗教教條之靈活調適的生動例證。他理解這種想法的爭議性，但他為這種調整進行了辯護，稱其目的不是在「濫用上帝的仁慈」。<sup>93</sup>假髮也被笛福歸類為商業時代中的奢侈品之一，

<sup>88</sup> Defoe, *Defoe's Review* 3, 95.

<sup>89</sup> Defoe, *Defoe's Review* 6, 21.

<sup>90</sup> Defoe, *Defoe's Review* 3, 65.

<sup>91</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 108; Defoe, *Defoe's Review*, 163.

<sup>92</sup> Defoe, *Augusta Triumphans*, 278.

<sup>93</sup> Defoe, *Augusta Triumphans*, 278.

但是根據笛福的上下文，這是笛福在論述英格蘭社會領先於土耳其社會的表徵。笛福認為，它們象徵著商業社會的一種新生活方式，並沒有提到任何負面影響。這是社會進步和享受繁榮的結果。

笛福的觀點是「我們的女士在衣著上的虛榮心，我們的紳士在飲酒上的虛榮心，導致了人們普遍的痛苦」，此外「儘管紳士們對奢侈品有些擔心，但他們意識到奢侈品對英格蘭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如果奢侈品變得不可或缺，他們能提出的唯一建議就是，至少英格蘭人應該消費國內商品，而不是外國商品，因為它們是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笛福認為奢華是英格蘭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認為追求奢華的慾望是英格蘭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奢侈品的消費對英格蘭的經濟作出了貢獻。如果它被強行拔除，那麼這將導致英格蘭貿易的消耗，以及無數人流離失所而步向毀滅。

追逐時尚與流行也許很可笑，但它們是他那個時代商業和製造業背後的驅動力，笛福決心接受它們。他認為，商人確實從花花公子(fops)身上受益，因為花花公子在「娛樂」和「衣物」上的鉅額開銷支撐了這些工商業者的生計。<sup>94</sup>笛福為這些商人辯護道，花花公子的放蕩行為與商人無關，因為他們從未強迫花花公子炫富。此外，如果公子們無法在英格蘭買到「上等絲綢、緞子和天鵝絨」，他們便會轉往法國購買。因此，若是強行去取締、禁止奢華，這種對自我慾望過度之滿足或許會暫時被壓抑下去，但是因為自愛與時尚的力量過於強大，享樂揮霍的行為旋即又將捲土重來。因此，笛福說強硬地禁奢只會讓英格蘭的貿易受到損害，而且奢華卻將始終存在。<sup>95</sup>

笛福與達文南特在奢侈品以及時尚的態度迥異，不過笛福跟他在看待奢華決定了國力強盛這一點上則是所見略同(見第二節)。兩人都認為在十八世紀的西歐，國與國之間戰爭的勝負關鍵已經不在於軍隊的縮衣節食以及耐力，而是在於哪個國家擁有最雄厚的財力(longest purse)來添置最先進的武器及雇用最為驍勇善戰的軍隊。<sup>96</sup>洪特所說的雙重層次的奢華辯論也清楚地呈現在

<sup>94</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25-226.

<sup>95</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12.

<sup>96</sup> Andrew Hamilton, *Trade and Empi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79.

笛福對此議題的思考中。笛福不認為現在英格蘭在時尚產業或者是飲食、衣物上的精緻化，同於讓「波斯、希臘、羅馬等帝國」解體的那類奢華。相對的，現在英格蘭的生活精緻化，其可以養活、支持的人口數目不僅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多數人不僅可以溫飽，甚至能享受到生活中的真切舒適(real comforts)。因此，奢華所帶來的益處在他看來並不是邪惡。當然，他在奢侈品當中仍有設下自己的界線。易言之，奢侈品當中有可以接受的，也有越過底線的。笛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可以改革許多特定領域的貿易，但不需要推翻和摧毀整個貿易」。<sup>97</sup>

笛福雖認為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當中，人不可避免要做出一些妥協。酗酒、賣淫、褻瀆神明等罪行固然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小酌幾杯或是享受舒適傢具則是應該被允許的樂趣。笛福所列舉的惡習必須在一定的背景下加以考慮。他堅持認為商人最大的惡習是「忽視他的生意」，因為這很容易毀掉一個商人，但是忽視生意當然不是一種邪惡行為。他在其著作中所謂的惡習並不同於違法行為或說是罪惡。而他之所以使用這種語言，則是因為這是當時代慣用的語言。笛福在離開不服從國教新教徒學院(the Dissenting Academy)之前就已經準備好當牧師了，他因此相當熟悉這個語言，所以稱奢侈品為「惡習」。許多當代作家焦慮地指出，商業、娛樂、甚至是少量飲酒都是罪惡的。笛福為了要讓讀者明白以及作為修辭之用，所以方才如此使用。

貫串笛福各種著作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人類的驕傲是不可能根除的；而且在十八世紀早期英格蘭這個新興消費社會中，要限制人們購買昂貴的東西和衣服是不可能的。正如笛福所說：「你可以抑制他們的奢華，但你無法保證能夠抑制他們的驕傲」。因此，禁止奢侈品消費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將徒勞無功。此外，這種禁止措施會造成傷害，笛福繼續寫道：「你們所有的禁奢法都無助於改革這一惡習，只會損害了這個行業」。<sup>98</sup>由於驕傲是不可避免的，笛福認為實際的可行措施便是正視並認可那些無害的揮霍，並且要警惕不要沈溺其中。<sup>99</sup>

<sup>97</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36.

<sup>98</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12.

<sup>99</sup>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2, 236.

笛福所批評的那類奢華，其本質便是縱慾，亦即超過適當的程度。借貸金錢來消費奢侈品自然也是超出了適度範圍，笛福因此反對人們透過信貸來借錢購買奢侈品。<sup>100</sup>笛福批評酗酒是一種社會不應該容忍的放縱行為，不過我們從他自己的說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所針對的不是酒精本身，而是縱慾。他寫道，傷害國家與個人福祉的不是「我們所喝的飲品，而是過度飲用(our Excess)；不是出於正常程度的飲用，而是出於那些不必要的濫飲(superfluous Drink)」。<sup>101</sup>恰當、適度的消費就應該被接受，笛福接著指出：英格蘭在餐桌上的「啤酒是我們國家最為健康、實用且有必要的飲品，而且主要都是要提供給一般家庭所使用的，並且許多理智清醒的人也都會享用」，這種酒類以及這樣子的消費方式，便應該被「排除在上述對於縱慾的批評之外」。<sup>102</sup>

笛福認為適度的奢華雖然有其可以被批評之處，但是仍舊是可以被容忍的。在酒精的例子中，笛福認為作為原料的葡萄和麥芽是無害的，烈酒和啤酒也是無害的，只要適量飲用即可。出售啤酒和葡萄酒的商店對於消費者的酗酒並不需要負起責任，因為他們並沒有強迫人們過度飲酒。<sup>103</sup>在商業社會，我們不應該期待完美的店主或商人。一個誠實的人；因為笛福提醒我們，我們「在生活中並不是在追求完美」。<sup>104</sup>

## 六、結論

本文研究了笛福對商業貿易與奢華的看法，並且著重在笛福認為成功商人的必備技能以及必要行為，以及它們與國家繁榮之必要聯繫。根據上文的討論，在笛福對於商業世界、奢華的論述當中，推動奢侈業興盛發展的動力、起源是這些消費者而不是供應之商人。笛福在《英格蘭商人全書》中給予英

---

<sup>100</sup>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60.

<sup>101</sup>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227.

<sup>102</sup>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227.

<sup>103</sup>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236-37.

<sup>104</sup>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29.

格蘭從事奢華產業的商人建議與鼓勵，要他們理解一個有德行的商人從事構成惡習之商品並不矛盾。在笛福的商業思想中，奢侈是英格蘭之所以強盛的關鍵因素，這些從事奢侈品行業的商人也因此對於國家有巨大貢獻。他們在英格蘭的地位之所以與日俱增，並且值得被尊敬，乃是因為他們是「靠誠實的勤勉(honest Industry)獲得金錢，刺激(英格蘭)貿易之繁華」的公民。<sup>105</sup>由於喜好享樂是人性中的一部分，這是商人再怎麼努力都無法扭轉顧客愛好的地方，笛福認為要求商人、乃至於官員要禁止奢侈品永遠都會是徒勞無功之舉。他因此指出，只要商人自己不消費奢侈品，那麼他依然可以保有其得行。此外，商人對於英格蘭經濟的貢獻，以及節儉的良好習慣，將使他有資格取代腐敗的鄉紳，成為新商業時代的社會新中堅份子。

本文指出，笛福對於商人的這種強調背後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笛福藉此指出商人需要在社會中扮演與神職人員同樣重要的角色，甚至比他們更重要。笛福曾經反詰地問道：教堂講壇上牧師們「在佈道時，究竟是如何從他們心中找到說法來反對這個時代的騷亂和奢華，反對這個貿易國家的驕傲和虛榮，反對酗酒和無度呢？」<sup>106</sup>在這當中酗酒確實是件邪惡行為，也因此是人類基於道德都應該要強力制止之處。<sup>107</sup>然而，「咖啡和茶」以及巧克力等商品，雖然有時在笛福的語言中被誇飾稱呼為「罪惡」，但是它們實際上並未造成任何人的傷害，並且讓消費者之生活變得更為舒適。根據本文之討論，笛福並不認為他們是真正的罪惡。相反，他認為這些產品不應該受到指責，甚至近來很多「神職人員，以及不服從英格蘭國教新教徒」都深知不應該反對這些產品。<sup>108</sup>

過去研究者多從笛福的態度究竟是鼓吹或是批判奢華來切入，本文則是以另一種角度切入：笛福透過調和宗教、德行與商業、奢華，他希望藉此創建一個基於溫和而非狂熱和迷信的社會，需要商業社會的新秩序在社會中得到更普遍的重視。過去針對笛福與曼德維爾的比較研究大多趨向籠統化，而

<sup>105</sup>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68.

<sup>106</sup> Defoe, *Defoe's Review* 9, 164.

<sup>107</sup> Defoe, *Defoe's Review* 3, 95.

<sup>108</sup> Defoe, *Defoe's Review* 9, 163.

本文對他們如何思考人性中的驕傲，以及其對於傳播文明進步中的重要性進行了具體的考察。上述對於溫和、中庸價值的提倡，也是本文所指出笛福與曼德維爾之關鍵不同。此外，本文將笛福置於其所處時代的辯論之中，並且扼要地指出他與當代重要文人之間的交鋒。雖然本文尚未能處理笛福的帝國思想以及他與達文南特在政治經濟思想上的重疊，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笛福特特別關注英格蘭在其特殊歷史背景發展中如何朝一個帝國發展，這與洪特所稱的新馬基維利主義者的達文南特確實有顯著的相似性，這會是一個未來值得學界繼續深入探究之問題。

##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 (一) 史料

- Barbon, Nicholas. *A Discourse of Trade (1690)*. Edited by Henry C. Clark. *Commerce, Culture, and Liberty: Readings on Capitalism before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2003.
- Davenant, Charles. *An Essay upon the Probable Methods of Making a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lance of Trade*. London: printed for James Knapton, at the Crown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99.
- Davenant, Charles.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 Part II*. Edited by Sir Charles Whitworth. Vol. 2. 5 vols.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Works of That Celebrated Writer Charles D'Avenant, LL.D.*. London, 1771.
- Defoe, Daniel.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Edited by P. N. Furbank. Vol. 4. 8 vols.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 Defoe, Daniel.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728)*.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7. 8 vol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Defoe, Daniel. *An Essay upon Publick Credit (1710)*.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6.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Defoe, Daniel. *Augusta Triumphans (1728)*.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8. 8 vol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Defoe, Daniel. *Defoe's Review*. Edited by John McVeagh. 9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Defoe, Daniel. *Some Objections Humbly Offered (1729)*.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8. 8 vol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Defoe, Daniel.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I (1725)*.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7. 10 vols.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Defoe, Daniel.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II (1727)*.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8. 10 vols.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Heywood, Oliver. *The Whole Works of the Rev. Oliver Heywood*. Vol. 5. Idle: John Vint, 1826.
- Mandeville, Bernard. *Free Thoughts on Religion, the Church & National Happiness (1720)*. Edited by Irwin Primer.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 Mandeville, Bernard.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Edited by F.B. Kaye. Vol. 1. 2 vols. With a Commentary Critical,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by F.B. Kaye.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988.
- North, Dudley. *Observations and Advices Oeconomical*. London: printed by T[homas] R[oycroft]. for John Martyn printer to the Royal Society, at the sign of the Bell without Temple-Bar, 1669.
- Shower, John. *A New-Years-Gift: Containing Serious Reflections on Time, and Eternity*. London, 1699.
- Steele, Richard. *The Trades-Man's Calling: Being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Nature, Necessity, Choice, &c. of a Calling in General: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ight Managing of the Tradesman's Calling in Particular*. London, 1684.

## (二) 專書

- Berg, Maxine.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Berg, Maxine, and Elizabeth Eger, eds.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 Bermingham, Ann, and John Brewer, eds.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1600-1800: Image, Object, Text*. London: Routledge, 1995.
- Berry, Christopher J. *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reuninger, Scott. *Recovering Bishop Berkeley: Virtue and Society in the Anglo-Irish Contex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Brewer, John,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 Dijkstra, Bram. *Defoe and Economics: The Fortunes of "Roxana"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7.
- Hamilton, Andrew. *Trade and Empi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 Hirschman, Albert O.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ont, Istvan.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undert, Edward J. *The Enlightenment's Fable: 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eier, Thomas Keith. *Defoe and the Defense of Commerce*. Victoria, B.C.: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Dep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87.
- Moore, John Robert. *Daniel Defoe: Citizen of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 Novak, Maximillian E. *Economics and the Fiction of Daniel Defo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76.
- Robertson, John.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ekora, John. *Luxury: The Concept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Eden to Smollet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lack, Paul. *The Invention of Improvement: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ogres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 (三) 論文

- Andersen, Hans H. "The Paradox of Trade and Morality in Defoe." *Modern Philology* 39, no. 1 (1941): 23-46.
- Berg, Maxine, and Elizabeth E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xury Debates." In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7-27.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Buchan, Bruce. "Changing Contours of Corrup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c. 1200-1700." In *Corruption*, edited by Manuhua Barcham, Barry Hindess, and Peter Larmour, 73-96. Expanding the Focus. Canberra: ANU Press, 2012.

- Dickey, Laurence. "Pride, Hypocrisy and Civility in Mandeville's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eory," *Critical Review* 4, no. 3 (1990): 409.
- Hartley, James E. "The Chameleon Daniel Defoe: Public Writing in the Age before Economic Theory." In *Money, Power, and Prin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British Isles*, edited by Charles Ivar McGrath and Christopher J. Fauske, 26-50.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 Hont, Istva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Debate on Commerce and Lux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Mark Goldie and Robert Wokler, 377-4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cVeagh, John.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leat English Tradesman."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7:1-32.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Thompson, E. P.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no. 38 (December 1967): 56-97.
- Vasconcelos, Sandra Guardini. "Robinson Crusoe in the South." *Aletria: Revista de Estudos de Literatura* 31, no. 2 (June 2021): 23-43.
- Whatmore, Richard. "Luxury, Commerce,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James Harris, 575-5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Daniel Defoe and the Debate on Luxury in the 18th Century**

Chen, Chienyuen

Assistant Professor(Contract)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uxury was a hotly debated topic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with many thinkers debating its moral implications and economic necessity, a debate in which the famous novelist and political writer Daniel Defoe took part. Scholars have previously discussed Defoe's views on luxury as a result of his extensive writings on business and commerce, but there has been no discussion of the nuanced differences between Defoe's views on luxury and those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particularly Mandeville, who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writer in this debate.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describe, and contras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efoe'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views on luxury as well as their debate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these debates on luxury and the fields to which this paper will contribute. The second section highlights the key participants in this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and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debate, mainly through its representative writer, Mandeville, a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him and Defoe. The third section will focus on Defoe's definition of luxury and how he defended the necessity and propriety of moderate luxury in his handbook for traders. The fourth section explor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luxury, and evil through practical examples, and where the line between them lies. In the fifth part, the development of luxury is put into the context of Defoe's thinking about civilization. Defoe argues that luxury not only promotes the strength of nations but also enriches life with more refined pleasures than in the past,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degradation. Defoe points out that luxury is not only in the form of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other expensive items but also in the form of coffee and tea, item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uman survival. Ultimately, Defoe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excessive attention to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is unfortunate, but by his day and age, it had already become closely bound up with the common good.

**Keywords: Daniel Defoe, luxury, human nature, 18th century England, consumption**